高万芹，张玉霖. 中坚农民：城镇化背景下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以湖北宜昌T镇为例[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1）：62-70.
GAO Wanqin，ZHANG Yulin. Successors of village cadres in rural area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 taking T Town of Hubei Province in Yichang as an example [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22（1）：62-70.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3.01.007

中坚农民：城镇化背景下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

——以湖北宜昌T镇为例

高万芹，张玉霖
（武汉科技大学 法学与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摘 要：基于典型案例解剖，探析中西部地区村干部接班人的类型及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研究发现，中西部人口流出农村地区，仍有一部分“中坚农民”成为村干部的有效接班人。通过分析当下村干部的主体及其接班人——“中坚农民”产生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其经济社会属性指出“中坚农民”能够坚守在村庄、愿意作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当家人”的原因，从而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了解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的现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中坚农民；村干部接班人；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3）01-0062-09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现状

城市化和农民流动是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和精英人士的外流不仅导致村庄缺乏有效的村干部，也导致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主体不足。“村干部接班人的问题”就成为党和政府在新时期需要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探讨村干部群体的角色行为及其变迁，主要是运用国家—社会框架来分析制度变迁和村庄社会变迁对村干部群体演变所产生的影响。

（一）国家视角

国家视角下的研究主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制度体制变革、国家行政权力介入基层社会的方式和手段上来分析国家对村干部群体演变产生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视角下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农业税费时期的“资源汲取”和后税费时期的“资源输入”的作用和影响。

1. 资源汲取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类型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围绕着村民自治和村干部的角色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重点分析国家行政力量介入和村民自治之间的张力对乡村治理主体产生的影响。尽管学界对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寄予较高的期望，并用“当家人和代理人”来形容村治主体的双重角色[1]，但由于国家资源汲取的目标和治理手段的不匹配，选择家族势力较大、具有灰黑背景的狠人、强人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基层治理再次出现“赢利型经纪”崛起的现象[2]。

2. 项目制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类型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分析项目制的实施对基层主体产生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以“科层理性”和“技术治理”为特征“项目治国”方案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3]，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依赖

收稿日期：2022-05-21 **修回日期：**2022-05-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模式和路径研究”（18CSH010）
作者简介：高万芹，研究方向：社会学及统计学，管理学，政治学。

正式官僚体制的基层政权建设仍无法杜绝一些寻租行为[4]。并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与自下而上的资源争取过程中，出现了地方政府与精英结盟的现象[5]；权力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精英分配利益的工具，村庄社会自主性缺失[6]；项目争取能力较强的“富人”成为县乡干部青睐的村干部人选，并且地方社会围绕着资源分配形成新的分利群体[7]。

（二）村庄社会视角

社会视角下的村干部群体研究主要是分析村庄内生的权力秩序，更加关注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现代性的进入对村庄权力秩序产生的影响，重点从纵向的农民分化和横向的农民流动两个层面来分析。

1. 发达地区的富人村干部研究。这一层面的研究通常认为在经济分层和社会分化的背景下，一批新兴的具有较强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本的富人、教师等能够作为新时期的乡绅、乡贤，承担起村落“当家人”的角色[8]，他们能够抵抗国家行政力量和不良政策的影响，也能凭借自身丰富的经济、社会资本来治理村庄，他们是乡土社会开展自治的重要领导人[9-10]。

2. 欠发达地区的村干部接班人危机。城市化背景下，有关中西部地区村干部群体的研究更主要的是探讨农民流动对其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认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缺乏有效的村庄精英[11]，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心化”导致村庄公共事务和民主治理缺乏有效的参与者和组织者[12]。农村家族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外流导致村治主体平庸化、断层，后备干部不足[13]；体制外精英的崛起也导致村干部的经济政治地位下降、治理动力不足，出现接班人危机[14]；村干部激励问题也被提上日程，并主张采用村干部职业化来解决上述问题[15]。

上述研究都从不同层面揭示出当下影响农村治理主体变迁的因素，但是存在以下不足。

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关于村干部群体的研究，一是主要关注东部发达地区、城郊区等地方的“富人治村”；二是探讨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项目制的实施对村治主体产生的影响，“项目村”、“典型村”也成为研究的重点。但这两类村庄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而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项目资源并不丰富的普通农村地区的研究则较为欠缺，现有的研究往往以“空心化”和村治精英“缺失”假设代替对村庄的实证研究。其次，从研究视角来看，在“精英政治”的价值预设和政治路线下，学界对“村干部”的类型特征研究重点关注农村“精英”，认为富人、乡贤等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才是合适的村治主体，把精英流失、普通村民“当政”看作精英断层、村干部群体“平庸化”和村级组织软弱无力的表现，并提出村干部“行政化”的激励方案来解决中西部地区村干部流失和治理动力不足的问题[16]。本研究基于现实调查经验指出中西部人口流出农村地区，仍有一部分“中坚农民”成为村干部的有效接班人和后备群体，他们成为当前村级治理的中坚力量。

为更好地分析上述研究内容和关键问题，本研究拟从三个层面来探析湖北省乃至中西部地区的村干部接班人问题：“谁是有效的村干部接班人？”“他们产生的经济社会基础？”“他们的参政动力是什么？”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围绕典型个案做解剖。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2019－2021年在湖北沙洋、红安和宜昌所做的调研，三个地区都是抽取纯农业型村庄。为方便表述和分析，本研究主要运用宜昌的数据资料，红安、沙洋仅作为对照参考。宜昌抽取了一个乡镇，之所以选择此乡镇，一是因为该乡镇村庄类型更为多样化，有的村庄没有土地，有的村庄有土地；二是因为村庄位置偏远，属于山丘高山地区，乡村内部的经济机会相对平原地区更为缺乏，农民外出打工和村庄精英流出的情况更为严重，村干部的接班人问题更为严峻，他们解决村干部接班人问题的经验，更具有代表性和紧迫性。

T镇位于宜昌市夷陵区西部，长江北岸，三峡工程左岸，为坝区库首第一镇，总面积152.3平方公里。T镇属大巴山脉支脉，地形以山地为主。全镇人口25 089人（2017年），辖1个居委会、12个村委会。2019年之前，村里的大部分干部为兼业型村干部，主要是因为村干部待遇低，保险政策待遇低，虽然村干部的待遇也在逐年提升，但仍然不足以支持家庭的生产和维系，大部分村干部不得不兼业。为进一步激励村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19年之后，地方政府进一步提升村干部的待遇，村干部也逐渐专业化。但在调

研中发现，虽然村干部个人实现了专业化，但村干部的家庭必须保持多元兼业的模式才能维系家庭的生存和发展，或者说多元兼业的方式由原先的村干部转移到其家庭成员身上，否则村干部就难以安心当村干部。那些能当村干部的人，大都是家庭成员在负担家庭的主要运转。因此，只有综合分析村干部个体及其家庭的整体特征才能更好地理解村干部的类型和特征，才能制定合理的人才政策和激励政策。

二、谁是有效的村干部接班人

什么样的人在当村干部，或者说什么样的人能成为村干部，是考察村干部接班人问题研究的重要维度。本研究通过实地考察村干部的特征和类型来了解什么样的人在当村干部，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当前村干部接班人所面临的问题及出路。本部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村干部的特征和类型：1. 社会特征，主要指他们的性别、年龄结构和文化程度；2. 身份特征，主要指他们当村干部之前的职业经历，是否是经济、文化或政治精英转化而来；3. 经济特征，主要指他们现有的经济与财富状况，特别是家庭的整体收入状况及其在村庄中的阶层地位。

（一）村干部的社会特征

表1和表2是宜昌T镇全镇村干部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从村干部的年龄结构上来看，中壮年占主力，总体呈现出老中青搭配的格局。全镇村干部的年龄基本在35～50岁之间，占56%；而年龄在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占22%；年龄超过50岁的占22%，其中村主职干部年龄在50岁以上的比例为30%，略高于全村的平均状况。从性别结构上来看，女性干部数量超过男性，但主职干部基本都是男性[①]，只有一个女性；而副职干部中，女性占了64%，比例较多。因此，村庄总体结构呈现出女性多从事副职干部，当主职干部的极少。此外，调研中发现，女性村干部的比例还在不断增加，女性当村干部的积极性比较高，男性当村干部的积极性则差很多。

表1 年龄与性别结构

单位：名	年龄（35以下）	年龄（35～50岁）	年龄（50岁以上）	性别（女）	性别（男）
主职干部	1	8	4	1	12
副职干部	14	30	8	35	20
占比	22%	56%	22%	53%	47%

表2 文化程度

单位：名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以上
主职干部	0	3	4	0	6
副职干部	0	6	12	15	22
占比	0	13%	24%	22%	41%

从村干部的文化程度来说，大部分村干部的文化程度属于中专以上，占63%。村干部的文化水平较过去有大幅度的提升。调研发现，村干部学历提升的原因，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推广的“一村一个大学生计划”，即年龄在45岁以下的村干部可以去读大专。不少副职干部通过“一村一个大学生计划”读了大专，这从整体提升了村干部群体的文化水平。此外，后备干部和新进的村干部文化水平往往在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二）村干部的身份特征

从村干部的身份特征来看，大部分村干部在当干部之前都有各式各样的职业经历，对于职业经历的考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村干部的特征和类型，也就是什么类型的人会进入村委。

本部分主要考察村干部进入村委之前的职业经历，并不涉及进入村委之后的职业特征和收入来源。

根据村干部当政之前的职业类型和经历，可把村干部划分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以及中坚农民。经济精英主要是乡镇附近或者在外地的企业主、工程老板、个体商户、技术管理层或专业大户等富人群体，这些群体年收入大都超过30万，位于村庄的上层。政治精英主要是指在党政、企事业机关工作的人或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老干部，政治经验和治理经验丰富。文化精英主要是指道德模范、文化权威，如

① 因为书记、主任是一肩挑，所以全村13个村（社区）只有13个主职干部。

宗族长、民办老师或民间文化活动的组织者等。中坚农民主要是指村庄或乡镇附近从事农副业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中青年群体，他们虽然年富力强，但却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外出务工，他们在家乡寻找各种经济机会，进行多种经营，从而达到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他们比企业主、工程老板、专业大户等富人群体的经营规模要小，收入更低，属于村庄中的“中等收入群体”。

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地方政府一直强调发挥富人、能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但富人当村干部只是少数，仅占13%。且都是一些工程老板、企业主，也是最近几年才上任。村庄中还有少数老干部，大都是政治精英转化而来，他们先从生产队长或副职干部做起，也可能是村办或乡镇企业负责人，慢慢转变为主职干部，但这部分老干部大都退休或退居二线，比例只占4%。除了这些少量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转化而来的村干部，村庄中大部分村干部都是一些中坚农民，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乡村内部的各类经济机会，但也会进行多种经营。大部分村干部在当村干部之前，都是一些中坚农民，是农村基层市场空间中年富力强的普通人。此外，调研中也发现，虽然政府想要把经济能人发展为后备干部，但经济能人愿意当后备干部的属于少数，大部分后备干部是中坚农民。

表3 身份特征

单位：名	经济精英	中坚农民	政治精英	文化精英
主职干部	3	9	1	0
副职干部	6	45	2	2
总体情况	13%	80%	4%	3%

（三）村干部的经济特征

本部分主要对村干部的经济特征及其阶层状况进行分析，即从村干部现有的收入来源和构成来分析村干部的经济社会地位。从社会分层来看，除了少量富人干部属于村庄的上层，大部分村干部都属于村庄中的“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T镇已经实现了村干部的职业化，无论村干部有没有其他收入，每个村干部每年都有3万～5万的收入。但这部分收入并不足以理解村干部的特征，需要对村干部家庭的整体收入构成进行分析。之所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析，是因为村干部只有保障家庭总收入能够维持家庭运转和保障家庭再生产的时候，才会当村干部。

从村主职干部的总体情况来看，T镇的主职村干部中，除了B村和D村的书记是资历较老的村干部外，大部分行政村的主职干部都是“中坚农民”群体。他们比“富”不足，比“下”有余，与村庄的狠人、富人等相比，他们可能显得较为“弱势”，权威不足，但与普通村民相比，他们又有一定的知识、信息、技术、文化水平等，有一定的影响力，逐渐成为合适的村干部人选。

村干部中属于富裕阶层的不多，只占13%，大部分村干部属于村庄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达到87%。村干部中没有位于村庄下等阶层，这是因为仅村干部的年收入都能达到4万～5万，再加上自家的茶园收入、小规模的养殖收入或家庭成员的其他收入，基本上都会超过5万。

表4 村干部家庭的整体收入状况

单位：名	农副业生产（小规模）＋村干部收入（中下阶层5万以下）	农副业生产（小规模）＋多元经营＋村干部收入（中等阶层5万～15万左右）	种养殖大户＋多元经营＋村干部收入（中上阶层15万～30万）	企业主或工程老板＋村干部收入（富裕阶层30万以上）
村支书	0	5	5	3
副职干部	0	31	18	6
比例	0	53%	34%	13%

在大部分村干部未进入村委之前，他们大都从事农业生产，会种植0.2公顷～1公顷不等的茶园，并在农闲时间从事其他业务，成为“半农半副”、“半粮半经”、“半耕半雇”、“半农半商”的兼业农户，而他们“半农＋”的多元家计模式也让他们的家庭总收入位于村庄的中上层。他们当了村干部以后，因村干部职业化的要求，个体会放弃原先经营的业务，成为专职村干部。但他们

个人成为专职村干部后并不意味着整个家庭放弃农副业生产的机会，大部分村干部会把自己之前从事的产业或农副业转交给家人经营。他们的家庭成员为增加家庭收入，赶上或超过原来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大都会继续进行多元经营，村干部在闲暇时也会帮忙，村干部的收入本身也成为家庭多元经营收入的一部分，否则，村干部很难专心当村干部。因此，从现任村干部的家庭收入来源来看，大部分中坚农民并没有因为当了村干部就变得贫困，而依然是村庄中的中上层，村干部家庭成员依然是多元经营的小农户，属于中坚农民群体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村干部个人收入虽然降低，村干部家庭的整体总收入却不低，或者说那些愿意当村干部的人，大部分是家庭的其他成员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或是家庭的总体收入能够达到村庄中等阶层以上的程度，能够维持家庭正常的运转。

村干部群体中占主力的是中坚农民，但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镇更倾向于动员经济精英当村干部，因此，在新上任的村干部中，属于富人精英的比例也越来越多。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年富力强的能人愿意回村当村干部，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乡村两级干部的反复动员，二是需要照顾家庭成员，或是小孩或是老人等。虽然回村当村干部经济水平有所下降，但回村后可以兼顾家庭，夫妻两人只需要达到中等收入的程度就可以维持体面的家庭生活，因此，即使经济水平有所下降，他们也愿意回村继续当干部，由家庭成员来从事农副业生产，从而成为中坚农民的一部分。但这仅限于一部分年富力强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真正的富人群体来说，他们并不愿意放弃自身的经济机会，依然是兼职干部，他们并没有把个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村干部身上，依然会抽出时间来从事其他经济业务工作，乡镇干部为吸引他们当村干部，对他们的管理会相对宽松。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中坚农民已成为宜昌T镇村干部的主力。从村干部的总体特征来看，村主职干部以男性为主，但副职干部中，女性比例较大；大多数村干部具有初高中文化，且村干部的文化程度有所提升，大专学历比例较高。主职村干部的年龄适中，多为中壮年，而新上任的主职干部都较为年轻。从村干部的身份特征和职业经历看，大多数村干部是中坚农民转化而来。相对来说，道德权威、宗族长等文化精英并不是村干部的主要特质，这说明在当地当村干部并不需要依赖家族势力或文化权力，更多依赖个体实力和能力。

其次，新上任的村书记主要是一些富人精英，属于富人主政，但大部分主职村干部都是中坚农民，从普通农民转化而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步步上升为主职干部。总体上看，村干部的任职和更替比较稳定。村书记的任职时间比较长，只有在村委班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可能出现一些年轻的富人书记。此外，T镇村干部的整体待遇较高，基本上实现了专职化。主职干部的收入在5万左右，副职干部的年收入也达到4万，另加养老保险。这些工资虽略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当地一个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年收入一般在5万～8万），但与城市的务工经商生活相比，在村生活成本非常低，花销也少，再加上家庭成员还有2万～4万的农副业收入，与外出务工的农户收入差不多，从而达到体面的家庭收入。因此，总体来说，村干部的家庭生活水平与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劳力差不多。

在村干部待遇较低的红安和沙洋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尤其是红安，村干部的待遇一直比较低，主职干部的年收入只有3万多，副职干部2万多，这还是最近一年才提升上来的。之前，村干部一年收入只有1万多，且只有书记才有养老保险，副职干部则没有。这些收入并不足以让年富力强的村干部专心当村干部，因此，村干部的兼业化非常严重，大部分村干部在当干部之余，都有一些副业收入，属于兼职干部。因此，在沙洋和红安，村干部的兼业化特征更为明显，只有年富力强的中坚农民才能当得起村干部。

从某种程度上说，村干部的收入越低，村干部兼职化程度越高，村干部的收入越高，一些青壮劳力成为专职村干部的可能性越大。但无论是专职干部还是兼业干部，从家庭的整体经营状况来看，大部分村干部家庭成员难以脱离农副业生产，依然成为“中坚农民”。这是因为村干部即使专职化，待遇得到提升，但在村干部工资尚未达到或超出普通小农家庭的收入水平时，大部分

村干部依然无法在村庄立足，需要家庭成员在村镇附近寻找一定的经济机会。这就导致当前村干部的工资待遇不论高还是低，村干部大多还是由中坚农民担任的现象。由于缺少足够的利益资源和经济机会，中西部偏远地区富人治村属于少数。而宜昌专职化村干部和红安兼业化村干部的区别在于村干部是个人从事多元经营还是其家庭成员从事多元经营。

三、中坚农民产生的经济社会基础

本部分主要考察中坚农民群体产生的结构性原因，从外在的经济社会结构来分析中坚农民群体产生的空间，从而理解村庄中为什么能够留住这部分青壮年群体，为什么又有青壮年陆续回村发展。

（一）中坚农民产生的社会基础

城镇化进程，由于农村经济机会缺乏，大量的青壮年选择进城务工，但也有部分青壮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难以进城务工。这些青壮年愿意留在村庄中或返乡发展，多与农民的家庭生命周期和人生任务有关。由于农业收益低下，农村发展空间有限，农民要想体面地完成家庭生产和再生产，大都需要外出务工经商，但与此同时，农民家庭也要经历形成期、育儿、壮大、空巢和死亡等阶段。有些阶段，需要家庭青壮劳力留守在家中照顾老小和病弱人士。因此，对于处于上有老、下有小以及家庭中有大病、残疾或精神疾患的农民家庭来说，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都会留守在家中。甚至原先在外发展还不错的青壮年，为照顾家庭成员，甘愿回村接受更低的收入待遇。此外，还有一些早年在外务工，四五十岁以后回村发展的壮劳力。这部分劳力的家庭养老任务繁重，劳动力的市场价值降低，在外务工的收益并不高。他们回村发展，经营一定规模的土地，再搞点副业，既能照顾家庭，收入也不低，反而成为他们较为理想的选择。

我们村的副书记43岁了，原来是工程老板，一年搞个20万~30万没问题，后来被我说服回来当村干部。他愿意回来，一方面是我的说服，最主要的还是考虑到要照顾家庭，他自己也想回来了。回村后，他们夫妻的收入加起来十来万，足够家庭的开支。我们村的治保主任也是，原先开工程车的，一年也有十来万收入，也被我说服回村当干部，天天在外跑照顾不了家庭。当村干部虽然收入少一些，但能够谋生，也能照顾家庭。（W社区书记，45岁）

对于留在村庄中或是返乡的青壮年来说，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寻找一些经济机会实现家庭的发展[17]。如果担任村干部，对他们的发展更为有利，可以凭借村干部的身份和地位，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此外，在人才流出，精英参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出于人才培养的考虑，也会积极提拔这部分人来当村干部，培养一些年轻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些青壮年就看到了自我发展的空间和政治机会，也愿意留在村庄中。青壮年会根据自身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家庭成员的需要和村庄中的发展机会，在进城还是返乡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但无论如何，农村中总有一部分青壮年劳力，因为家庭发展的需要和劳动力市场价值降低的情况不适合外出务工，这就成为外在的结构性原因，保证了一部分“中坚农民”群体在村的稳定性。此外，还有不少青壮年因为性格、技术、特长、父母期待等原因不愿意外出务工，愿意在村发展，他们也是中坚农民群体的重要来源。

（二）中坚农民产生的经济基础

从中坚农民群体的生存机会来看，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林牧副渔业，一类是农业生产的上下游环节，以及集镇范围内与农民生活有关的服务项目。在村庄层面，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村庄中存在一些农副业机会，耕种适度规模土地的种植户，还有少量的养殖大户。乡镇层面主要是一些企业雇工和商业服务项目，但由于T镇的经济地理区位优势并不明显，只有个别加工企业，能够提供给农民的雇工机会比较少。商业服务项目主要是一些卖菜肉、副食品、衣服、摩托车等基础民生用品，也包括酒店、旅馆、餐馆、超市、建筑队、红白事服务队、农机、电工、木工、钻井、运输车等服务。由于乡镇的主要功能是发挥集聚效益，满足村民在农业生产上下游环节和基本的生活服务需求，因此，在整个乡镇层面的机会结构，主要是在流通和消费环节上，表现为乡镇的商业网点和服务

体系。

T镇的经济体量虽然不大，但仍有一部分资源和经济机会让农民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对于留在村庄的青壮年来说，他们在农业生产之余，往往利用闲杂时间从事其他业务，形成“半农＋”的多元家计模式。以M村为例，M村有2020人，730户，全村可耕地有160公顷，林地303.4公顷[①]。从村庄的人群特征看，全村有七八十个20～50岁的青壮年劳力，这部分劳力占全村劳力的10%左右。除了个别身体残疾、智障的人外，留村的青壮年大都成为经济能人，他们有些是适度规模的种养殖户，有些在村庄和集镇范围内从事多元经营。M村适度规模的种植户有10来户，一般在0.33～1.33公顷的规模，1公顷地的茶园收入有6万～9万元不等，户均0.2公顷地的年收入就有1万多。有8户的规模达到0.67公顷以上，主要种植茶叶，兼种一些蔬菜、红薯、土豆等经济作物，农业生产管理以自家劳动力为主，只有在采茶环节可能需要雇少量工人。大的养殖户10多户，其中5户养猪，3户养蜂，其他几户养鸡鸭。养猪的除一户养殖规模在50头～100头之间，其他大都在10～30头。村庄中还有一些在乡镇附近打工的商服人员，包括农技服务、电脑维修、机电维修、木工、瓦工乃至挖机司机，还有一些运输司机、茶叶经纪人、小商铺老板、酒店餐馆老板、小建筑老板等。

这部分青壮年群体一年收入在4万～10万，也有少量收入在10多万的农户，他们成为在村“中等收入群体”。由于村庄中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这几十户在村“中等收入群体”在村庄中的地位和功能就凸显了出来，逐渐成为村庄生产发展和治理的中坚力量。

四、中坚农民的参政动机与政治机遇

外在的条件把中坚农民推了出来，而从中坚农民自身来说，他们有一定的动力来参与村级治理。中坚农民群体长期生活在村庄之中，他们跟普通群众相比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头脑比较灵活，或是在某方面比较突出、勤劳上进，在收入水平上稍微高出普通群众。他们大都年富力强，因为家庭、性格，或喜欢农村的生活方式而留在农村发展。他们也承担着家庭生产的任务和压力，因此，渴望通过村干部的平台和社会关系来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一）经济收益

从直接的经济收益上来看，村干部每年4万～5万的工资收入虽然不高，但对于中坚农民群体来说，还是有较大的吸引力。有了这部分收入，再加上家庭成员的其他收入，就能达到村庄的中等收入水平，实现家庭体面的生产和发展。除此之外，村干部还有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这也大大提升了村干部职位的吸引力。因此，村庄中并不缺乏应聘村干部的人选，特别是一些在村青年女性群体（女性在乡镇附近务工就业的机会较少，收入也就在3万～4万），她们当村干部的积极性较高，在照顾家庭的同时，还能获得一个整劳动力的收入。

其次，从潜在的利益关系来看，村干部的身份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坚农民群体结识村庄内部和乡镇层面的精英，从而在土地流转、政策资源、市场信息的获得方面优于普通村民，获取更多的家庭发展机会。一些有头脑的村干部就可以抓住这些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能够与外出务工经商者持平甚至更高。当然，乡镇干部的积极培养也十分有必要。乡镇干部利用自身体制性的身份和资源，通过各种手段来动员、培养和选拔一些在村的中坚农民群体，使他们不断增强自身的经济社会实力和政治地位。在村中坚农民群体也确实需要乡镇政府的帮助。由于在村的青壮年大都是一些普通农民，并没有什么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特殊的社会关系，在乡镇政府的帮助下，他们能够知道更多的政策信息，遇到更多的机会。

F村村书记，原本在外做小包工头，年收入20万左右，后因公心不错、政治素质高，被乡镇动员回村当村干部。刚回村时，作为副职干部年收入仅有3万多，难以维持家庭的运转和开支，心理落差比较大，数次提出辞职。为让他安心做村干部，经乡镇干部引介，他兼任了某工程公司的监理（主要是利用他的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每年有3万~4万的收入，加上村干部的收入4万多，还有自家几亩茶园和果园的收入，每年就有

① 以下M村的数据资料主要是村委、小组长和个别村民的访谈中汇总的，特别是各个小组长。

10多万，虽不如以前收入高，但可以体面地维持家庭运转，他也逐渐安心在村庄中发展。（F村书记，45岁）

（二）社会收益

从社会收益和自我价值实现来看，当村干部也能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面子荣誉。在农村社会之中，村干部毕竟是村庄中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尤其对中坚农民群体来说，他们不是超级富豪，可能只是普通村民，从无政治、社会地位的普通村民，到被村民和乡镇干部认可的村干部，他们能从这种社会性面子中获得自身的地位感和存在感，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当中有一些能力较强、公心较好的人逐渐成为村治主体。因此，我们看到T镇的村干部大部分是“中坚农民”群体。

五、结论与建议

中坚农民群体已成为中西部偏远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的重要来源。他们在人财物流出的大背景下，逐渐成为村庄权威秩序的维护者和村干部的重要来源。他们是一群在村的青壮年群体，该群体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在村庄中，收入水平位于村庄的中间位置。他们是村庄中的小规模种养殖户、家庭农场主、小商户、经纪人、村医、运输司机、农机手、水电工、木瓦工等，他们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主要从农副业生产环节和上下游的流通服务环节，以及一些满足农民生活需求的商业服务项目中获得收入来源。他们往往是多元兼业的小农，与普通村民的差异不大，但由于年龄、身体素质、文化和技能水平、社会关系资源的优势禀赋，使他们在村庄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突出，成为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合适的村干部接班人选。

中坚农民群体成为村干部与中西部地区特有的经济社会结构有关。特定的经济社会空间造就特定的权威类型，中西部普通农村地区村庄内生权威表现为一部分中坚农民群体。从这部分权威产生的经济基础来看，中西部地区以农副业生产收益为主的经济资源总量决定了在村的内生主体很难是富豪。较低的农业生产力和有限的基层市场空间难以滋养大量的富人群体，只能供给一部分青壮年劳力来获得家庭再生产的经济资源。虽然中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资源总量不足以让农民富有，但也没有全面地凋敝和空心化。农民外出打工带来了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使得农村社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得以集聚，村庄剩余劳动力的价值得以提升。再加上乡村振兴和惠农资源的输入，不断地滋润着农村的产业发展空间和市场空间。部分在村青壮年可以通过占有这些机会和资源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从而在经济社会地位上与多数外出务工的村民齐平，或略高于普通村民。因此，随着村庄富人群体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大量外出务工，常年在村的农村人口结构就表现出一部分年富力强的中坚农民和大量老弱群体留守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中坚农民群体就逐渐成为村治主体的主要来源。

其次，从中坚农民群体自身的参政动力来看，由于中坚农民群体自身的经济利益主要在村庄中，能在不耽误自身农副业生产之余额外获得一份经济收益。一些农村的公共政策，村庄的公共品建设往往事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村庄政治事务较为关心，并且，他们也愿意在村庄的公共事务中带头，以获得社会价值和自我实现。总之，中坚农民群体能够从担任村治主体的角色中获得一定的经济社会收益，这也成为当下利益资源贫乏、工资报酬待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中坚农民仍愿意出任村干部的原因。

在上述事实下，本研究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应当积极保护中坚农民群体，保护在村青壮年生存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中坚农民群体成为中西部农村地区维护村庄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政界和学界对中坚农民群体的重视不够，中坚农民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尤其是土地大规模流转、资本下乡等挤压了在村中坚农民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政策导向上，国家不应鼓励和帮助资本下乡打压在村农民的生存机会。第二，中坚农民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财政扶持的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尤其要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让中坚农民在生产环节能够享受良好的上游服务和下游服务。第三，破除村治主体富人化、精英化才能维系村庄生产发展的想象，加强对中坚农民村干部的激励。中坚

农民已成为村级治理的重要力量，应加强宣传中坚农民群体作为村治主体和后备干部的政策导向和舆论导向，并从选拔、激励和奖赏等多个层面加强对中坚农民干部的激励。

参 考 文 献

[1] 徐勇. 村干部的双重角色：当家人与代理人[J]. 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8）：147-158.

[2] 吴理财. 农村税费改革与“乡政”角色转换[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5）：20-26.

[3] 周飞舟. 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 兼论“项目治国”[J]. 社会，2012，32（1）：1-37.

[4]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9（6）：104-127.

[5] 折晓叶，陈婴婴.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1（4）：126-148.

[6] 李祖佩.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J]. 社会，2016，36（3）：167-191.

[7] 陈锋.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 社会，2015，35（3）：95-120.

[8] 高万芹. 乡村振兴进程中新乡贤的类型界定、功能实践与阻力机制[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21（5）：87-95.

[9] 卢福营.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J]. 社会科学，2008（12）：55-63.

[10] 郎友兴. 政治吸纳与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基于浙江省的调查与思考[J]. 浙江社会科学，2009（7）：108-115.

[11] 吴重庆.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J]. 读书，2011（1）：19-25.

[12] 王玉娟.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留居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路径思考[J]. 理论与改革，2011（5）：101-102.

[13] 陈潭，刘祖华. 精英博弈、亚瘫痪状态与村庄公共治理[J]. 管理世界，2004（10）：57-67.

[14] 王立争. “接班人”危机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1）：56-67.

[15] 宁泽逵，柳海亮，王征兵，等. 村干部向何处去——关于村干部“公职化”的可行性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05（1）：58-65.

[16] 贺雪峰. 村干部收入与职业化[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1）：64-66.

[17] 韩庆龄. 电商经济与村落社区的现代性转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46-148.

Successors of village cadres in rural area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 taking T Town of Hubei Province in Yichang as an example

GAO Wanqin，ZHANG Yulin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65，*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ypes of village cadres′ successors and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while the population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flowed out of rural areas，there are still some "backbone farmers" who have become effective successors to village cadres. By analyz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 and attributes of the "backbone farmers"—the main body of the current village cadres and their successors，it explores why the "backbone farmers " can stay on the village and are willing to be the "heads" of the village′s public affairs，which provid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the successors of village cadres in rural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Keywords：Backbone peasants；Successors of village cadres；Urbanization

（编辑：程俐萍）